

義和團運動史研究

路遙程獻著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路遥 程 焱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3.75印张 2插页 305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5333—0035—1

K·6 定价：3.10元

前 言

多年以来，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研究志趣，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对于义和团运动史作了探索。由于我们对这场农民反侵略运动的认识基本一致，因而在选题、立论和研究方法上都颇多相通之处，并且在考察一些基本问题时达到了相同或相近的结论。为了求得更多的批评与指教的机会，兹将我们的一些在研究方向上一致而在内容上又可以互相补充的文稿集为一束，奉献给读者。这些文稿中有一部分是经过修改的旧作，一部分是近年来的新作。成书之前，我们在充分交换了意见的基础上，又根据全书的体例，对各篇作了相应的增删和调整。因此，这本合集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共同的认识。

本书没有涉及义和团运动史所应审视的各个方面，也没有汇集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其他心得，它在内容上多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这是出于以下考虑的。八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的总课题中尚处在后进状态，它的研究成果或研究队伍，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赶不上太平天国史、戊戌变法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还有不少没有深入探究甚至是尚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课题，有待于人们去开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义和团运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阶级阵容和思想风貌，以及它在世界范围所引起过的巨大的震动，因而又吸引了国内外不止一代的研究者，并使他们不约而

同地将研究的兴趣，集中在该领域的某些最能反映历史复杂性的课题上。比如仅就义和团源流研究而论，就陆续出现了一批颇有见地的专著和论文。人们正是通过对于一些重要专题的反复研究，经过不同学术见解的热烈争论和互相补充，推进了对于义和团运动史的认识。多年以来这样一种研究状态的沉积，在客观上是形成了义和团运动史的某种独特的研究途径或方法，即人们通常是以一些关系着这一历史事件全局的重大研究课题入手，进行比较细致的史料考证、史实分析和比较深入的理论概括，先突破一些难点；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以利于从历史的顺向和逆向、从事件的正面和反面、从社会变动的各个角度去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我们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稿，也是上述研究状态的映象。它试图围绕着义和团运动史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几个重要课题来展开我们的认识，其中粗浅的心得和探索的失误，也许都可以成为同行们进一步研究的铺垫。

这本集子的内容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和直鲁交界一带爆发？这是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者经常涉及然而又是探讨得比较薄弱的课题。迄今还鲜有专论述及，人们的看法也不全一致。如有的论者认为这场运动起于侵略与暴政，有的认为这是反洋教斗争的汇合和迸发，还有的认为灾荒和经济变动是运动的主要成因。本书在《义和团运动斗争初期阶段概述》、《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及《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等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这场运动的社会与地区成因，应当从客观的各种历史契机和斗争主体的成熟程度这样两个方面去寻找。从客观条件上看，

调动拳民斗争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动过程中，有一个起着决定作用的要素，这就是在国际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的大背景下，割据山东的德国帝国主义势力将军事占领、经济侵略和宗教渗透相结合，从而把山东变成了民族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区，引起了从政治、经济直到文化观念上的一系列复杂的冲突。这类冲突，又以教会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它不仅反映了全国范围的民族危机的普遍性，而且带着当地古老的社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特殊性。于是，散处在社会上的各种反抗力量，无论是各阶层人民延续已久的反洋教斗争，还是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激剧的饥民、游民谋求生存权利的斗争，都集中到了“毁教灭夷”的激流中来。而这个激流之所以首先从鲁西南和直鲁交界地区泛起，则和当地民间结社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方向、阶级阵容和斗争风貌。不过，本书作出的探讨还仅仅是初步的，比如对当时的经济变动未作深入剖析，就是一个不小的弱点，这也是笔者今后应当继续努力的。

第二，义和团的组织源流。这个问题是对拳民运动成因探索的延伸，即从斗争主体的角度研究这场运动的社会渊源和组织形式。由于研究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经久不衰的兴趣。以往的有关论著林林总总，成果斐然，但似乎也存在着某种不足，即有些论者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在组织上极端的分散性和参加成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却过分强调了这类分散的组织在来源上的同一性（如“白莲说”、“团练说”），从而使研究陷入了某种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任何一种单一不变的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容纳那样庞杂而广泛的

反侵略人群。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倾向于用多层面、多渠道的考察方法，来审视义和团的组织起源。为此，本书把义和团组织的形成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对于山东义和团初起时参加斗争的几种主要的民间组织，如大刀会、义和拳、神拳和某些地区的乡团作了分类研究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去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以便找出义和团运动在组织上的主干。而为了了解这些民间组织的来龙去脉，又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之下，就是说，要把对山东与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团组织源流的考察，和对历史上活动在各地的同类组织形式的考察结合起来，力求把握它们的历史全貌和演变特点。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占去了本书相当大的篇幅。从《义和团运动斗争初期阶段概述》中对拳会、刀社的分别考察，到《乾嘉义和拳浅探》、《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和《神拳蠡测》这三篇专述，反映了我们对义和团源流的认识积累过程，而《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和《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则可以算是我们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个粗浅的小结。

第三，清朝政府与义和团运动。这个题目在近年以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开始改变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那种明于知己而昧于知彼的状态。同行们的有关著述，使我们获益良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总的看法是，应该避免仅仅从清王朝与义和团双方冲突与联合的过程中去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概括出清朝封建统治者对拳民斗争是采取“剿”或者是“抚”的应变政策。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武装侵略引起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综错交织，使清王朝面临的形势要比以往单纯对付农民起义复杂得多。因

此，我们应该从国际国内这三大势力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总背景出发，去研究清王朝那种较之历来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剿”、“抚”政策要更为复杂多变的政策动向，去分析清朝当局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各地方政权在政策上的异同，以及这一切引起的政局变动对于义和团斗争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清朝中央政府和山东、直隶两省当局在拳民运动勃起时的政策变化过程，《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则用了主要篇幅去探讨运动高潮阶段清朝中央政府和北方诸省统治当局的政治动向。当然，这种轮廓性的描述并未完成从农民斗争对立面去认识义和团运动史的任务。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和南方各省的“东南五保”，本书也未设专章探讨。我们愿意和同行们在一起把这个课题继续深入下去。

第四，义和团运动中的民众意识。我们俩人都从事着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工作实践中总有一种感觉，即从事这门学科的人们通常注意了对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理论形态进行研究，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对于特定时期的民众意识的探索。所谓民众意识，是指特定时期在社会上大多数人中间流行的普遍性意识，包括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受着人们的心理素质与人格特点所制约的日常意识、政治意识和宗教意识。近代的民众意识，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几亿普通中国人对社会变动的直观反映。由于这种意识的巨大的群众性和实践性，因而从一个侧面制约和影响近代史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进程。要了解近代一个历史事件的全貌，除了从政治、经济、理论形态等角度去认识之外，不应当忽视当时的普

通民众对这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这种研究对于义和团运动史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没有政治家领导和思想家驾驭的、完全由普通民众组合而成的爱国反帝斗争，当时亿万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政治要求和人生态理想，直接规定了这场运动的认识水平和思想风貌，产生出围绕着侵略与反侵略的主要矛盾而展开的中西思想文化相撞击的广阔画面。因此，研究义和团运动中的民众意识，对于进一步认识这场运动的社会成因与表现形态，特别是对于通过这一历史事件来剖析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或文化心理结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和其他文稿的有关部份，对于当时的民众意识作了尝试性的探讨。由于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题目，而且涉及到象社会心理学这样一些为我们所不熟悉的领域，所以认识上的偏颇和谬误，一定是在所难免的。

《义和团运动史事举要》和河北威县景州等两篇调查记，也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史事举要》，是我们多年搜集资料随手抄录形成的。因本书以探讨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及其组织源流作为主旨，所以对史事举要亦以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为止。义和团运动是以分散、自发斗争为其显著特点，文献资料对这场运动发展全过程缺乏系统记述，时人笔记、日记、杂录对它的记载也多陷于东鳞西爪，所以有一篇较为完整而系统的义和团运动史事系日，乃是研究义和团运动所急需的。另两篇都属于调查资料选编。为阅读这些资料有一基本概念，特写了《威县义和拳活动调查记》和《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的义和团活动》。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其重点活动是在山东，但在直隶大名、广平和河间等府所属也

有所展开。本书对这些地区的活动没有专篇论述，《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的义和团活动》可以适当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两份调查资料，实际上都是依靠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学下乡调查取得，本书的作者路遥同志是这几次调查的组织者和指导教师。

以上所谈，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我们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求得与读者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交流。如前所述，我们的认识是不成熟的。而且由于分头执笔以及写作时间、论证角度和分析粗细的差异，在某些具体提法上也难免有不全求同之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是不会穷尽的。这不仅是某些新史料的挖掘将会修正以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随着研究者观察角度的更新和辨识能力的提高，还可以从熟悉的史实中获取新启示。我们愿意在与同行朋友们的切磋商讨中继续深化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力争及早写出一本比较完整的义和团运动史来。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学术界同行朋友们的许多鼓励，深望我们能早日整理、撰述出版。特别是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有幸阅读了不少珍贵的清宫所藏档案史料。没有这些史料作为基础，本书不少篇章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史馆编辑部主任朱金甫研究馆员还审读了本书的一些篇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参与了《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的修改。对于这些同志，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1986年9月

目 录

前 言

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概述·····	1
冠县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运动·····	33
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	64
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99
乾嘉义和拳浅探·····	138
神拳蠡测·····	169
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	205
义和团运动初期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态度·····	245
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	279
义和团运动史事举要·····	315
威县义和拳活动调查记·····	357
附录一：威县义和拳调查资料选编·····	365
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的义和团活动·····	386
附录二：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 调查资料选编·····	393

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概述*

1900年义和团运动距今已有六十周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爆发了一次规模极为宏伟的反帝斗争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斗争高潮。这个运动曾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①。

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虽发表了一些论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有许多问题未被深入探讨，例如义和团运动是怎样发生、发展？义和团的组织及其源流演变如何？义和团的政治要求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义和团组织中的阶级关系如何？等等。对于这些重要问题未予深入探讨，对义和团运动也就不可能作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从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它显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活动（1896年——1899年）第二阶段主要为义和团在河北、京津的

* 本文原标为《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刊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2期。从本书的体系看，本文只是概述性质，这里对原文加以修改，改题为《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概述》。

①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发展及其失败（1900年——1901年）。本文试图就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1896年——1899年）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借以抛砖引玉，寻求问题的解决。

（一）

义和团运动的酝酿，是从甲午战后山东曹、单一带反洋教斗争开始的，到1900年发展成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帝斗争运动。

中国近代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反洋教斗争的规模也得到扩展，中法战争以后又逐渐趋向高潮，从1891年开始的长江中、下游的反洋教斗争浪潮已经显示了中国人民新的斗争大风暴即将来临。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统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革命斗争高潮形势遂以产生。甲午战后的革命斗争高潮仍然是步循着反洋教斗争的轨迹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天主教、基督教是先遣部队，外国传教士充当了侵略的先锋。它们分布在各地建立侵略据点并包庇教民欺压平民，直接危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主教、大司铎、神甫和一部分教民构成了一个侵略网，在各地搜集民情风俗、地形、物产等情报为帝国主义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侵略打下基础。事实上，外国在华的宗教侵略活动多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和指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对外掠夺市场的要求开始迫切起来，它企图追随法国侵略者的道路利用天主教作为先遣队。1885年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德籍传教士安治泰，便是德帝的侵华先锋之一。1887年安治泰回柏林时，就开始与德国政府进行密切勾结，德皇威廉第二说：“在

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将中国各项的重要事情报告我。”^①当1896年德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胶州湾这个地点之后,他就迫切地要求德国政府采取“一次有力的行动”。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他又向德皇建议乘机侵占胶州湾。德国外交部认为“安治泰主教的声明迫切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实是有关教会的存亡,我们不能不加以极端的重视”^②。可见当时天主教的在华传播曾体现着该国政府的侵华政策,而宗教侵略与政治、经济侵略又是互为因果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建筑铁路、攫夺矿权,危害了山东人民的利益,这一切都与传教士有关,因此山东人民对天主教的仇恨实际上就是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罪恶活动的仇视。

外国侵略者不仅利用宗教传播为其军事殖民政 策开辟道路,而且还通过宗教势力在山东各地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严重的同时,社会危机也日益加深。战后的赔款负担和繁重的赋税剥削,加以灾荒连年,使广大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形成一群极为庞大的饥民队伍。贫苦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要求日趋激烈,特别是山东曹州、东昌一带从来就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或反抗斗争最多的地区,他们在甲午战争前夕为反对封建压榨所引起的饥荒即已酝酿着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并在各地遍布了秘密会社的组织。到了甲午战后,外国传教士、教民利用清统治的腐朽,并在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在各地对广大劳苦群众加紧封建剥削:放取高利贷,

① 邵循正《天主教士中的两个特务间谍—樊国樑和安治泰》,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

② 同上。

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例如1899年春的“平原教案”，“初起之时实因连岁歉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穷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必不容若辈之剥削，遂至事起仓猝，纷争不已。”^①这样，贫苦的农民大众便很自然地把他们因失去土地而沦于饥寒的愤恨，把他们的斗争目标从封建统治转移到外国宗教侵略势力方面来。当时有民谣云：“不下雨，地发开，全是教堂止住天！”^②这是人民群众深刻痛恨外国教会进行封建剥削的写照。所以甲午战后山东人民对洋教士的仇恨，实际也隐寓了反对封建剥削斗争的要求。

同时，各教堂更因清政府整个统治机构的腐朽，在甲午战后凭籍其已取得的特权在各地实行政治统治。当时有这样的文献记载：“中日一役以后，中国政权为外人遏抑，地方官为外人攘夺，仇恨外人之心亦因此而愈深。”^③初任曹州知府后升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在其奏折中说：“奴才窃维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驕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④这种宗教侵略的气焰在天主教方面表现得尤其

①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御史高熙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页。

② 包士杰：《拳时杂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12页。

③ 《教案奏议汇编》卷4《伟论旁参·教士辨言》。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凶恶，在山东南部安治泰所管辖的教堂区域内，枪械林立，训练队伍，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在胶州湾事变以前，这些天主教传教士早就享有了与地方官并行的政治特权，在各地包庇杀人犯，干涉诉讼。胶州湾事变以后，他们更加仗势横行。1899年初总理衙门拟定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对传教士的政治特权作了明确规定：总主教、主教与督抚同品，大司铎与司道同，其余司铎与府厅州县同，各级地方官准其请见^①。这样一来，凡是有教堂设立及其影响所及的地方，群众莫不受传教士的统治压迫。当时山东省天主教堂的传布特别多。据记载山东的天主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1904年（光绪三十年）止，教堂的分布分东、南、北三境。东境有住堂4、会所138，北境有住堂7、会所417、公堂216，南境有住堂9、公堂21、大堂5、小堂72、分堂270^②。义和团运动所爆发的南境与北境地区计有七府、二直隶州、七十九县。每县以四十保（保即乡）计，则有三千多保。平均每三乡就有一个教堂或会所^③。若仅以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发展最激烈的曹州、东昌、济南三府来看，教堂分布尤其严密，有的每乡三、四个教堂，有的如单县东南乡李集一带在方圆不到二十里的范围内就设立了七、八个教堂。象这样的教堂密度在当时只有河北、山西两省堪与比拟外，是他省所罕有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在这三省爆发并得到激烈发展，从教堂的分布与统治来考察也并非偶然。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加深同时，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37。

② 李枋：《拳祸记》下编。

③ 根据曹州府、东昌府若干县的地方志统计得出的数字。

社会危急也日益严重，各地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也日趋强烈。但由于这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不能不逐渐集中到外国侵略者身上。外国侵略的先锋队——传教士在各地的统治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侵略矛盾的焦点，因此凡是教堂所管辖及其力量所波及的地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便不能不首先以反洋教斗争的形式爆发起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已内含有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实质。

甲午战后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首先就是在德国天主教势力的地区——曹州府掀起来的，领导反洋教斗争的是曹、单一带的大刀会组织。李秉衡说：因“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①《茌平县志》中也说：“甲午而后，强邻虐肆，中国怯弱，人民益忿。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之说兴矣。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偏及村庄，纷纷设场。”^②可见大刀会学习金钟罩之术以抵制外国侵略的公开活动，显然是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些情况分不开的。1896年上半年，曹、单的大刀会在江苏丰县、安徽砀山和山东单县一带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当时砀山教民仗势欺压平民，抢割平民地内麦禾，庞家林富户庞三杰遂约请曹县刘士端的大刀会赴砀境攻毁教堂^③。以后曹、单大刀会的反洋教斗

①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李秉衡奏办理曹、单等处会匪情形折，《李忠节公奏议》卷12。

② 牛占城修：《茌平县志》（1935年）卷11《灾异志》。

③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页。

争影响到很广的地区，它以山东曹、单为中心，旁及河南虞城，安徽砀山、亳州，江苏丰县，山东城武、鱼台、金乡、定陶等各县^①。大刀会反洋教斗争虽在1896年6月被镇压下去，但到了1897年11月，另一支大刀会又在巨野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即所谓“巨野教案”。德国政府以巨野教案为口实乘机出兵占据胶州湾，山东各地传教士的凶恶气焰也因之更加嚣张。档案中记载：自德人占据胶澳，气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借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②。于是反洋教的斗争便从曹州沿东昌、济南、临清各府州发展。光绪二十四年冠县十八村拳民阎书勤等奉赵三多为首爆发了反洋教斗争^③。这次斗争产生较大影响，从此之后东昌府各地“滋教”之事时常发生。此时曹州府属的大刀会亦辗转流入东昌府各地，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朱红灯所率领的拳众在平原县境进行反洋教斗争并与官军互抗，随后又转入禹城、长清、茌平、博平、高唐州等地展开斗争活动。与此同时，河北东南部景州一带的义和拳也展开了反洋教斗争。于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声势得以扩大，摆脱地方性的规模向河北发展，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帝斗争运动。

义和团运动初期在山东实际上就是经历着上述的“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平原教案”等这几次具有影响的斗争活动而逐渐扩展起来的，但引其端者却是曹、单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为什么说义和团运动发端于甲午战后曹、单大刀会的反洋

①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李秉衡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页。

②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黄桂鋆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45页。

③ 侯光陆修：《冠县县志》（1934年）卷10。